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砚台： 见证了中国早期工运的光辉篇章

展陈地：首都博物馆

讲述人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王永玺

□本报记者 白莹 文/摄

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砚台（复制品）

展陈在首都博物馆的这方菊花砚曾是1922年马林与高君宇、罗章龙等书记部工作人员使用的。马林离开中国后，砚台由高君宇、罗章龙使用，高君宇病逝后，菊花砚一直由罗章龙收藏。直至20世纪90年代，罗章龙将其赠送给马林的女儿作为纪念。

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永玺介绍，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。中国共产党一成立，就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。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，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。在党的第一个决议中明确指出，党在当前的“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。”1921年8月11日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，北京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，罗章龙担任主任，王尽美担任副主任。

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北大学生，他们对工人有求必应。如工人吴国有受工头欺压无处申诉，就到北京大学西斋找书记部帮忙讨公道。工作人员王复生当即给外国总管祚曼写了一封法文信，说明是非。工头因此受到责难，吴国有被从宽发落。当然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要任务对工人进行马克

思主义理论教育，提高工人的觉悟，致力北方地区的工人运动，在其领导下京津地区的各工会纷纷建立起来。

1922年，党的二大通过《关于“工会运动与共产党”的决议案》，确定开展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。同年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往北京，由邓中夏担任负责人，中国铁路总工会、长辛店工人俱乐部、京绥铁路工会研究所等也在其领导下相继成立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，得到了工人热烈拥护。党在北方地区工人中和社会上的影

响日益扩大。

北京总部成立之后，联合各分部开展了“劳动立法运动”，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政治自由。同时，继续派出特派员深入重点工矿企业，积极参与工人罢工运动的组织与领导。如毛泽东、刘少奇到安源路矿，罗章龙、林育南等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等。据相关资料统计，1922年，全国各地罢工100多次，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。

1923年2月7日，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惨遭直系军阀血腥镇压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联合沪上

各工会团体，连续发出《通电》《敬告国民书》《二七大屠杀的经过》《告全国工人书》，在揭露吴佩孚等军阀祸国殃民和残酷屠杀工人滔天罪行的同时，还指出工人“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，化除行业的意见，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，再联合农民、商界、学界同心努力，打倒大家的共同敌人——军阀，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”。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，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历史高潮。

1925年5月1日，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。会上选出以林伟民为委员长、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领导机构。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完成历史使命而宣告撤销。从成立到结束的3年零9个月时间里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工人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教

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模型： 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

展陈地：长辛店二七纪念馆

讲述人：中国工运研究所副所长 关明

□本报记者 余翠平/文 于佳/摄



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模型

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里，有一个“长辛店工人夜班通俗学校”的模型资料，为了了解这里面的红色工运故事，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工运研究所副所长关明，他将这个文物模型背后的工运历史缓缓道来……

从1920年4月开始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“提倡平民教育”为名，在原工人子弟学校的基础上建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，办学宗旨是“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，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”。北京大学学生会租了长辛店大街祠堂口1号的三合院作为校址。

劳动补习学校刚成立时，很多工人认为：“耍手艺的人，学这有什么用？”“我也不想往上巴结，费那个事干什么？”“要给窝窝头，我就去。”起初，来上课的工人寥寥无几。后经过党组织耐心解释，慢慢地，下班后主动来学习的工人多起来了。

关明介绍，作为推进工人运动的长期据点，学校分设日夜两班，日班是为铁路工人子弟而设，课程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。夜班为工人而设，课程有国文、法文（当时工厂被法国和比利时人控制）、科学常识、社会常识、工场和铁路知识以及社会发展史、工人运动等内容。工人及其子弟“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，都可入学”，还“概不收学费”。因开办经费太少，

工人们课本由北大学生们编印，纸笔也是北大师生们捐助。史文彬等还登报四处募捐，经费再不够时，由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约80元作为办学校和共产党北京支部的费用补助。

在长辛店，劳动补习学校的教员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具有良好的文化知识水平。邓中夏、张国焘、罗章龙、张昆弟、何孟雄、朱务善等人每周到长辛店住校一两天，晚上上完课后挤在一间小房子里。每人一个月7元的生活费，他们却都省下几元钱买茶叶、糖果招待来上课的工人。工人们时常找这些教员代写家信，有病时也

向他们讨教药方，甚至还请“先生们”帮助解决家庭纠纷。时间长了，穿短襟衣服的工人们和穿长衫的先生们成了嘘寒问暖的一家人。

对于夜班课本的选择，曾有过这样的争论：有人认为可以采用吴稚晖新编的平民常用二千字的课本，也有人建议采用日班学员使用的国文课本，但邓中夏主张另编课本。他认为应该把工人的生活，工人日常用的工具、器物都编在这课本里。要让工人读了书就晓得他用的老虎钳子怎样写、锉刀是哪两个字。为了强调工人团结，教员要进行形象的教育。如邓中夏讲授《工人最伟大》一课，当有

工人问他，工人为什么受穷呢？他回答说：工人穷不是八字不好，也不是命中注定的，而是军阀、厂主剥削工人劳动造成的。邓中夏告诉工人，要想不穷，大伙就得抱成团。团结起来。邓中夏后来总结说：“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手方法，借此接近群众，目的在于组织工会。”

1921年5月1日，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“五一”劳动节大会。天津、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，《晨报》和《京报》的记者都到场报道。会议宣布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会成立。会后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，散发传单以及《五月一日》和《工人的胜利》两本小册子，高呼口号“劳工万岁”“八小时工作”“一小时教育”“五一节万岁”“官僚是公仆，工人是神圣”等等。当天晚上，工人们在娘娘宫演出了话剧和相声。邓中夏称其为“中国空前未有的真正的工人群众的示威游行”。

“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，利用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等形式，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组织起来，创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、马克思主义走进工人的成功实践，对于总结探索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模式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。”关明最后感慨地说。